

三位“红色金融家”为革命军队当家理财 每一枚铜板都用在刀刃上

一手紧握枪杆子，一手狠抓钱袋子。革命需要枪，也需要钱！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红色金融与革命军队同根共生，相辅相成。不少半途出家的“红色金融家”，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和经济环境的双重挑战，“好钢用到刀刃上”，不断创造金融奇迹，“货币战场”捷报频传。

这里，记下的是革命军队初创之后，如何依靠智慧、胆略和牺牲精神当家里理财的故事……

“扁担银行”

毛泽民肩挑红色金融命脉

红军长征行进队列中，红军中央纵队第十五大队的番号始终是“谜”。

这支由上百人组成的特殊编队装备的武器是160多副扁担挑子，载有黄金150斤、白银840斤以及大量珠宝、银元、苏维埃国家银行印制的纸币，还有几台印钞机和铸币机……为了实现中央红军战略转移，守护红色金融仅存的微弱火种，服务党中央财政需求，保障红军物资供给，这个世上最小的国家银行被挑在肩上，踏上了征途。

早在1931年末，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就决定筹建国家银行，并委派在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展露杰出理财能力的毛泽民任行长。这是中国共产党最早建立的全国性银行，日后逐步发展成为根据地经济的重要支柱。

银行刚创立，只有从闽西工农银行转来的20万元，人员仅有行长毛泽民、会计科科长曹菊如、业务科科长赖祖烈、总务科科长莫均涛、会计钱希均。文化水平普遍不高，履历中与银行业务最接近者也就当过杂货店店员。任务艰巨：建立一套独立的中央银行体系，统一财政，调整金融，加强苏区经济建设，保障红军作战所需。

有一次，前线部队送来一批缴获的现洋，经手人员发现，现洋的包封纸竟是国民党税务机关的四联单。毛泽民赶紧召集大家对四联单仔细分析研究，对金库的管理制度和流程加以改进，使金库资金的收款方、管理方（国家金库）、使用方和支配方都有了相应的记录，保证了财务制度的严谨。毛泽民签发通知，要求红军各级政治部、供给部，注意收集有关财政、银行、企业管理知识方面的书籍、文件、账簿、单据、报表等实物，备作参考。随着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慢慢正常运转。

时有“假币幽灵”游荡在苏区，搅乱了刚建立的金融体系，怎么办？毛泽民一直找不到破解之术，一个意外让他茅塞顿开。一天晚上，毛泽民伏案工作，身上的羊毛衫烧着了，促发了奇思妙想——何不在制造纸币时掺入一定比重的羊毛，这样可通过透视纸币的特殊纤维，亦可通过火燎纸币发出的羊毛焦味辨别钞票真伪。

1934年10月长征开始后，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被编为中国工农红军，毛泽民担任起“扁担银行”的政委，在国民党数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和极端

险恶的环境中，没放弃尝试利用货币的发行和回笼，帮助军队沿路筹款，驰援百姓活跃贸易。

遵义是长征中进驻的最大城市。1935年早春的遵义，土匪军阀横行，官僚奸商霸市，市面上的“硬通货”是鸦片。当地百姓对苏区纸币不感冒。毛泽民看到集市上的食盐价格高得离谱，掌控在不法商贾手里，老百姓吃不到盐。红军进遵义城打击军阀奸商，缴获了价值几十万元的食盐。毛泽民决计将盐投放市场，且以极低价格销售，规定必须使用苏币。短短十余天，毛泽民带领员工设立兑换点，百姓可用银元以1比1的比例兑换苏币，红军也可拿苏币在市场上购买物品。苏区纸币凭借良好信用，迅速流通起来。不久，“扁担银行”接到随部队转移的命令，撤离遵义前在闹市区张贴布告，设立30多个兑换处，用银元、食盐等物资换回百姓手中的苏币，不到一个月，完成了苏区纸币的发行、流通至回收的全过程，创造了金融史上的奇迹！

当中央红军1935年秋冬之季抵达吴起镇时，14名苏维埃国家银行干部只剩下8人，家当尚存黄金2担、白银及银元12担，另有珠宝若干。核对账目发现，除了长征路上的正常开支，没损失一块银元。毛泽民的名字因此镌刻在红色中国货币史上：一次是以总经理身份出现在“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股票上，另一次是以国家银行行长身份印制在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第一套货币上。

“马背银行”

高捷成穿山越岭开垦战地金融

“行无固址随军游，工无桌椅在炕头。有事即办无日夜，钱账随身安无忧。”这首由当年冀南银行普通员工撰写的打油诗，再现了抗战岁月里“马背银行”的真实工作场景。

高捷成，中国人民银行前身之一的冀南银行首任行长，被称为“红军会计制度的创始人”“我党金融事业的奠基者”。在民政部公布的第一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中，他是唯一烙有“金融印记”的人士。

1928年，高捷成考入厦门大学攻读经济学，未毕业便来到上海中南银行谋职。工作之余，他找到上海地下党组织，白天吃银行饭，晚上装成人力车夫张贴革命标语、散发革命传单，不幸被捕。出狱后的高捷成回到漳州老家，在宗叔开办的百川银庄做出纳。

其时，漳州龙溪农民在共产党福建省委的领导下开展了武装斗争，成立了农会和农民赤卫队，武装抗捐抗税，打击土豪劣绅。活跃于漳州九湖、南乡、漳浦一带的游击队队长王占春系高捷成的同学，当高捷成去游击队驻地探访时，看到多名游击队员身负重伤，没药品医治痛苦不堪。他想到银庄里贮存的银元，借经管业务之便，从银庄借用2万元帮游击队购买药品和武器，缓解了队伍的燃眉之急。

红军在漳州驻扎40余天，高捷成先后协助红军筹款100多万银元，部分

银元之后被运到江西瑞金，成为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建立的资本金，对红军在整个长征途中起到极其重要的保障作用。在王占春鼓励下，高捷成告别刚分娩的妻子和父母北上抵达中央苏区。他走后没几天，登门催款的银庄老板踏破高家门槛。对于先前借用的钱款，高捷成向银庄表示，所欠钱款，时刻记挂，当“国家得救，民族得存，清债还利，不短欠分文”。

踏上瑞金，高捷成入了党，协助毛泽民草拟经济计划，筹划组建银行。卢沟桥事变爆发，他随八路军129师挺进太行山，开辟晋冀鲁豫敌后抗日根据地。1938年，日军对太行山根据地进行军事扫荡与经济掠夺，金融市场动荡不定，货币混乱，币值不一，给革命工作带来诸多不便，边区提出“要造出独立自主的地方性货币”。1939年10月，山西省黎城县小寨村的一间农家四合院，挂出“冀南银行”的招牌，经邓小平举荐，高捷成出任行长兼政委。

冀南银行对外号称八路军工作团，为避免暴露目标，高捷成对厂址和隐蔽点都实地反复查看，印钞厂建在深山沟里，机器设备、印钞纸油墨分散在岩洞中。三个印钞厂可做到3小时内安全转移，物资和设备大多通过关系和渠道，从日伪占领下的石家庄、德州等地采购而来，要靠人背马驮的方式躲避敌军围追堵截，冀南银行也因此获称“马背银行”。

冀南币投放市场初期，市面上法币、山西票、河北票以及各种流通兑换券，相当芜杂，甚至还有伪钞鱼目混珠。高捷成提出，货币要进行整顿，全边区应由冀南币占领阵地，尤其要打击伪钞，肃清土杂钞，建立冀南币为本位币的统一市场。几经争斗，冀南币信誉上升，阵地扩大，币值增高，站稳了本位币的脚跟，成为解放区流通最广泛的一种货币，供200个县四千万人口使用。

1943年5月，敌人又对冀南地区发动大规模扫荡。当时，高捷成正在银行总部召开会议，获悉后立即马执行隐藏银行物资的预案并要求员工迅速转移。之后返回总行部署反扫荡工作，几位同志建议立即撤离，高捷成却坚持到附近分行开展救援。一天下午，一行人赶到河北内丘县白鹿角村，由于汉奸告密，敌人包围了他们借宿的院子。突围到村外时，高捷成发现警卫员没跟上，又返回寻找，不幸被敌人的子弹击中，长眠不起，年仅34岁。

“窑洞银行”

朱理治足智多谋试水金融创新

红军到达陕北瓦窑堡后，被誉为“窑洞银行”的陕甘宁边区银行横空出世，继承了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红色金融的血统，同时作为抗日战争时期最早设立的革命根据地银行，从1937年10月1日成立，至1947年11月因变身为西北农民银行，一直扮演着边区政府金融中心的角色。

那段时期，陕甘宁边区金融陷入了困境，财政寅吃卯粮，捉襟见肘，边

区银行唯有依靠发行边币来接济，造成边币贬值，物价飞涨，群情大哗。

危难之际，党中央于1941年3月任命朱理治为陕甘宁边区银行行长。朱理治虽曾考入清华大学经济系，但入学不久便投身革命。

新官上任三把火。朱理治头一把“火”直指“解决紧迫的财政困难，帮助发展生产事业”。他认为解决金融问题的关键在于生产，为此致信毛泽东，建议对公营事业放款“需重新配备，设法调剂，如能发展者促其尽量发展，不能发展者则收回放款转移生效最大之处”。在毛泽东的支持下，“窑洞银行”加大了对农业生产、贸易的放款力度，农业贷款从无到有，并以折实方式发放耕牛、农具等贷款，即按市价将贷款折成实物（粮食或棉花）放出，农民收获后交还等价实物。朱理治的“普惠金融”实践，创造性与灵活性兼而有之，帮助农民解决了困难，促进了生产，银行的经营状况也得到了改观。

由于流通信誉尚未建立，边币也就无法统占边区内部经济贸易市场。在民间，表面上不允许使用法币，实际上拿边币通常买不到东西。一些商家往往采取“暗号”进行买卖。朱理治想了一个既能集聚民众存款、又能提升边币信誉的两全之策：开办有奖储蓄。

1941年9月，“窑洞银行”推出第一期有奖储蓄，发放50万储蓄奖券，设立5万元奖金，相对于50元的本钱来说，奖金可观，一石激起千层浪！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发布《告边区同胞书》，着力宣传储蓄意义，朱德、林伯渠等组成劝购团，并聘请延安市长李景林、市商会会长白振邦等知名人士为开奖委员会委员，推进了民众对储蓄奖券的认购热情。据当年12月29日《解放日报》报道，50万元奖券基本售完。1942年1月1日，适逢元旦放假，延安当众开奖，头奖号码23083蹦落出来，幸运者为关中地区的一户农民。随即，敲锣打鼓声中，朱理治亲自把巨奖送到农民家中。有奖储蓄的面世，不仅克服了边区通货膨胀和发展经济、打破封锁的矛盾，更重要的意义在于提高了民众对银行发行边币的信任度，体现出边区政府、人民军队与老百姓的鱼水之情，收效甚好。

陕甘宁边区金融人才匮乏。为了广招人才，朱理治不惜采取“贷款收买”的办法，与陕北公学、中国女子大学等建立“互惠”，由银行为其提供生产资金，作为交换，银行从这些学校中抽调知识分子，先后共50余名。经过朱理治的一手操持，陕甘宁边区银行工作人员的知识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大学生占到员工人数的40%以上。

朱理治出任“窑洞银行”行长尽管只有两年，却是边区银行最活跃的光景。在他主持下，逐步建立了边区独立自主的货币体系，完善了新民主主义国家银行的职能，探索形成了完整的金融网络以及健全的规章制度，实现了诸多“革命根据地金融史上的创举”。边区革命金融工作进入了一个鼎盛时期。来源：解放日报